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影响研究

陈明明 刘禧瑶 聂其辉*

摘要: 如何避免落入不同收入阶段中的发展陷阱是每个经济体面临的重要挑战。通过构建企业家精神、经济循环与经济体发展陷阱跨越理论框架,探析了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02—2017全球创业观察(GEM)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发展陷阱本质是经济体无法从低收入经济循环向高收入经济循环转换的一种发展状态,而企业家精神则是推动经济系统这一转换的“扳道工”;然而,经济体能否跨越发展陷阱与其企业主密度关联性较弱,原因是企业主群体具有结构性特征;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主—企业家,通过实施要素新组合的创新活动,打破旧有低收入经济循环,推动经济体进入新的更高收入经济循环,因此创新型企业家占比增加有利于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履行管理职能的企业主—高级经理人,拒绝毁灭性创新带来的经济破坏,固守于旧有经济循环,因此管理型高级经理人占比提高加大了经济体落入发展陷阱风险。

关键词: 企业家精神 经济循环 发展陷阱

DOI: 10.19592/j.cnki.scje.400897

JEL分类号: M13, O10, O31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6249(2023)05-001-16

一、引言

一个经济体在任何收入阶段都有落入发展陷阱的风险,在发展初期会面临低收入陷阱(“马尔萨斯”困境),在起飞阶段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克鲁德曼-扬”诅咒),在成熟阶段会面临高收入陷阱(“日本病”停滞)(Ito, 2016)。中国何时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在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如何避免落入高收入陷阱,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以低收入阶段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中等收入阶段的拉丁美洲、高收入阶段的日本为例,利用世行数据,借鉴Woo(2012)研究方法,将上述三个地区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与美国的比值作为衡量落入发展陷阱风险的指标^①,如图1所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之比变动甚微,基本平行于美国基准水平线,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无法收敛于美国,分别落入了“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二战后日本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长迅速,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收敛于美国,甚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超越美国;但1995年以后,日本与美国的人均

* 陈明明,青岛大学商学院,E-mail:760893874@qq.com;刘禧瑶,青岛大学商学院,E-mail:799270495@qq.com;聂其辉(通讯作者),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E-mail:qihuinie@163.com,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龙泉路237号,邮编:650221。

基金项目:本文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9M66091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2BJL073)、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ZR2022QG002)、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22DJJJ01)资助。

① 当比值下降时,表明经济体落入发展陷阱的风险提高;当比值上升时,表明经济体落入发展陷阱的风险降低。

国民总收入之比不断趋于下降,特别是2001年以后日本人均国民总收入开始落后于美国,两者的经济发展开始趋于发散,当前仍存在扩大趋势,这表明日本虽然处于高收入阶段,却落入了“高收入陷阱”。可见,发展陷阱并非偶然现象,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存在于不同发展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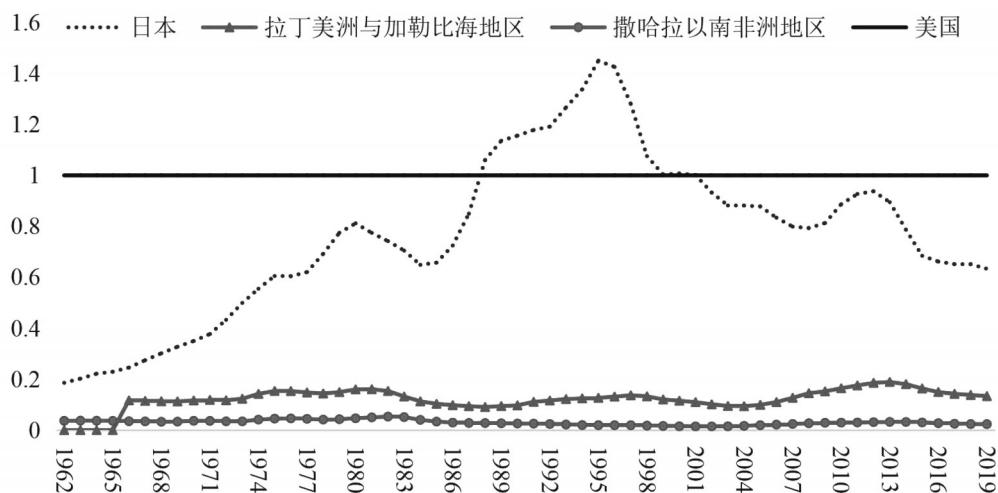


图1 1962—2019年不同国家或地区与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之比变迁

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经济体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生产要素之一,被誉为经济增长的国王(熊彼特,2020;张维迎、盛斌,2014)。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企业家精神在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过程中发挥着什么作用、担任着怎样角色?本文将基于熊彼特动态经济发展理论,构建企业家精神、经济循环与经济体发展陷阱跨越的理论框架,并利用2002—2017年全球创业观察(GEM)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讨企业家精神对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影响。

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第一,以企业家精神视角研究发展陷阱问题,探讨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内在机制,有助于拓宽关于发展陷阱的现有研究边界。第二,基于动态经济发展理论,重新定义发展陷阱,以此将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阶段的发展陷阱纳入到同一个分析框架,有利于对“马尔萨斯”困境、“克鲁德曼-扬”诅咒以及“日本病”停滞等经济发展现象作出一般性、普遍性的解释。第三,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正确认识企业家的作用,重新定位企业家社会经济地位,为培育企业家精神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回顾

Gill et al.(2007)在《东亚的复兴》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中等收入陷阱”描述的是一个经济体从“起飞”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就可能长期徘徊在该阶段(Ohno,2009),如同落入“陷阱”而无法实现向高收入国家过渡,处于一种超稳定均衡的经济状态(蔡昉,2011)。

“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原因。其一,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受阻论。技术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因技术创新不足而导致产业结构不能适时升级,将会阻碍人均国民总收入的进一步提高(Lin and Wang,2020;毛盛志、张一林,2020)。其二,制度缺陷论。世界上成功走出“中等

收入陷阱”的国家无一例外克服了制约经济增长的“制度高墙”(张军扩等,2019)。其三,财富分配不均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分配恶化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达到伤害经济激励的程度,就会产生一系列经济增长阻力(郑秉文,2011; Ahmad and Nayan, 2019; 张来明, 2021)。其四,人口结构转型制约论。伴随着从低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转变,经济体原有的“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开始显现,人口结构转型加大了发展中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蔡昉,2011)。

“中等收入陷阱”存在与否。部分学者通过对比分析大量不同经济体经济发展事实后,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确实存在(Eichengreen et al., 2012; 龚刚等, 2017)。另一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高伟,2010)。从绝对意义上来看,如果将高收入国家定义为人均GDP超过某一定值,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理论上都可能具有上升趋势,迟早会加入高收入行列,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Han and Wei, 2017); 相对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也没有意义,理由是从长期来看,任何一个国家最后都会内生地自然进入高收入行列(Barro, 2016)。

现有文献从不同视角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研究,得出一系列有重要价值的结论,为本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大多数已有研究,一方面更多关注于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发展陷阱问题,而缺少将其他发展阶段中的发展陷阱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 另一方面主要基于政府视角研究经济体如何跨越发展陷阱,着重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忽视了企业家对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影响。因此,对发展陷阱的研究仍存在探索空间。

三、理论分析

(一)经济循环与收入阶段

实现一般均衡的经济系统即进入一种均匀流转的经济循环。在一个分工和自由交换社会中,经济系统是一种由产品、生产要素、货币构成的循环系统,产品与生产要素通过货币媒介在企业和公众之间按照一定的方向进行循环流转。在特定技术水平下,当经济系统达到一般均衡时,价格使所有产品与要素市场完全出清,生产者与消费者实现利润与效用最大化,社会福利水平不存在进一步改善空间。在均衡状态下,每个经济主体只是参照以往经验决定的方式行事: 具有持久来源的生产要素被反复组织生产,经过一成不变的加工过程生产出产品,然后按照相同分配原则进入要素所有者手中,最终被消费掉以维持要素的持久生产力。其中,企业主仅是经理人,履行的是管理职能,只领取管理工资不获得经济利润。此时,达到一般均衡状态的经济系统便进入了一个首尾相衔的闭环均匀流转的经济循环过程,产品总收入等于要素总收入,全部的产出与分配相互抵消。

在一般均衡状态下,低收入阶段的经济系统处于低级经济循环,高收入阶段的经济系统处于高级经济循环。假设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过程经历 n 个不同收入阶段,每个收入阶段对应着不同技术水平,相对高的发展阶段拥有相对高的技术条件,反之亦然,如图2所示。在每个收入阶段中,当技术水平一定时,经过市场竞争机制调节后,经济系统最终会实现资源配置最大化,达到一般均衡状态,进入一种均匀循环流转的过程。在相邻的两种不同技术条件下的收入阶段中,当市场实现了一般均衡,较低收入阶段与较高收入阶段的经济系统虽然都进入一种均匀循环流转状态,但这两种阶段的

经济系统分别属于低级均匀循环系统和高级均匀循环系统。由于流转于低级经济循环中的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要低于高级经济循环中的生产要素,因此低收入阶段的人均产出低于高收入阶段的人均产出,这也是两种实现了一般均衡经济循环的根本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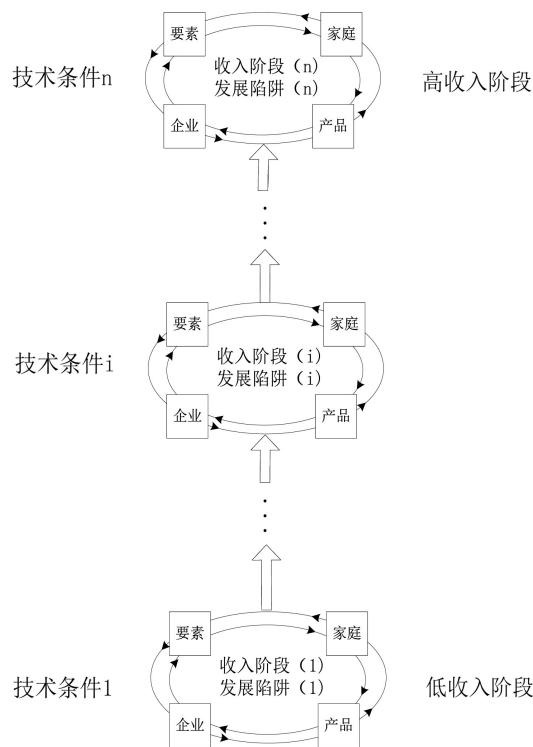


图2 经济循环、收入阶段与发展陷阱

(二)经济循环与发展陷阱

当一个经济体长期处于一种超稳态静止的均匀经济循环时,即停留于低级稳态经济循环而无法转轨到更高一级经济循环,该经济体就陷入了发展陷阱。落入发展陷阱的经济体,其商品流和要素流在既定渠道中周而复始流动,上一期的生产与消费情况与下一期无差异。正如熊彼特所言“生产要素虽然在经济系统中永恒流动,但总在原地陀螺般固定而均匀地运转”(熊彼特,2020)。在稳态均匀经济循环中,人均产出始终保持不变,经济增长停滞,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和边际产品收益率远低于在高级经济循环之流中的生产要素,且这种均衡状态超稳定。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史表明,落入发展陷阱的经济体是处于一种超稳定的一般均衡状态,一般外在干扰因素难以打破这种均衡;换句话说,当某一外力试图打破这一均衡状态而提高经济产出水平时,由于这一外力具有暂时性,且会被其他力量制约,使得经济系统回到初始均衡状态(蔡昉,2011)。

在超稳态均匀经济循环状态下,经济体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增长。经济系统只是循环往复式简单再生产或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不存在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这是因为经济系统中人均产出始终保持不变。即使经济系统是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也仅仅是由要素驱动的数量上的规模报酬不变式增长,而不是质的规模报酬递增式增长,对既定人均产出没有任何影响。因此,低收入阶段的经济系统即使

存在增长,也仅表现为产出总量的增加,而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继续维持在较低水平。所以停留于低级经济循环而无法跨进高级经济循环的经济体最终落入发展陷阱。

据此,从经济循环视角看,跨越发展陷阱是指经济体从低收入经济循环转轨到高收入经济循环的动态过程。经济系统从低级循环流转状态向高级循环流转状态转换,意味着经济体实现了真正增长,完成了从较低收入阶段向更高收入阶段的跳跃,摆脱发展陷阱。具体而言,在跨越发展陷阱过程中,旧有经济循环存在一种自发形成的不连续的颠覆性变化,这种变化通过提高循环渠道中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进而打破低级循环均衡状态,突破旧式框架和传统路径,并在新的条件下逐渐形成一种人均收入更高的高级循环之流,以新的均衡状态永久性代替旧的均衡状态。因此随着内生于经济系统中变化所带来的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提高,经济体脱离原有低级均匀经济循环流转,进入高级经济循环流转之中。

(三)企业家、经济循环与发展陷阱跨越

经济体从低级经济循环转轨到高级经济循环的直接原因是,旧经济循环轨道中形成了新技术条件,要素边际生产力得到了提高,生产出更多和更具有价值的财货。这种变化既不是外生的变化,也不是连续的线性变化,而是内生于循环之流的颠覆性变化。由于人的欲望一般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颠覆性变化一般发生在供给侧而不是需求侧(熊彼特,2020)。而供给侧的颠覆性变化即是流转于原有渠道中要素的新组合,对现有生产要素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提供新产品或服务。生产要素之所以有动力从旧组合中抽离出来实施新组合,其原因是在新组合中边际生产力更高,生产出来的新产品或服务价值更高。正是因为这种内生性新变化(要素新组合)提高了既有要素边际收益,使经济系统中人均产出得到永久性增加,并推动经济体从原有低级经济循环转轨至高级经济循环,从低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

打破低级经济循环并推动经济系统进入高级经济循环的源动力则是实施创新活动的企业家,其最为本质特征是对原有处于一般均衡的超稳态经济循环进行创造性破坏并将经济系统引入更高一级的经济循环中,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打破旧有均衡和引向新均衡。根据所承担的任务,企业家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熊彼特所说的实施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家,在经济系统中引入新生产方式、采用新产品、开拓原材料新渠道、开辟新市场、发明新组织形式的人,称之为熊彼特型企业家(熊彼特,2020)。为了获得更高利润,熊彼特型企业家率先打破既定原有轨道中均衡经济循环,其任务就是从事毁灭性破坏,变革惯例,通过改变技术条件或实施要素新组合提高原有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使经济系统脱离处于静止状态的低级均匀循环之流,在均衡中创造不均衡。第二种企业家类型是柯兹纳型企业家。该类型企业家是通过警觉到别人未发现的市场机会,将资源从被低估的市场配置到被赋予更高价值的市场中去的人,称之为柯兹纳型企业家,其任务是将经济系统从不均衡引向均衡(柯兹纳,2013)。这两类企业家既有本质上的相同点,又有过程上的异质性:熊彼特型企业家与柯兹纳型企业家从事的活动本质上都是创新行为,均促进了经济发展;前者是打破经济均衡,后者是实现经济均衡。如果说熊彼特型企业家是开拓者,那么柯兹纳型企业家就是模仿者,前者创新行为为后者模仿行为指明方向,后者模仿行为又为前者创新行为提供了刺激。经济系统由熊彼特型企业家从旧循环中驱离后,再被柯兹纳型企业家引向新的、更高级的均匀经济循环。因此,打破低级均匀经济循环并推动经济体进入高级均匀经济循环,是由熊彼特型企业家和柯兹纳型企业家共同完成的。

创新活动是由企业家内在的特殊品质所驱动的,建立个人王国、对胜利的渴望、创造的喜悦、坚强的意志共同构成了企业家精神(熊彼特,2020)。企业家往往是少数率先敢于在原有均衡循环渠道中实施要素新组合并将经济系统由低质量经济循环推向高质量经济循环的人,这些开拓者的本质特征就是企业家精神。当经济系统处于均衡状态时,企业生产活动只存在正常利润,经济利润消失;此时,为了获得超额利润,企业家凭借敏锐的先机洞察力和灵敏的直觉判断,率先打破既定原有轨道中均衡经济循环,提高流转其中的原有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对经济系统实施毁灭性破坏,使经济体摆脱旧有经济循环束缚,并推动经济体进入一个人均产出更高的经济循环,最终经济体以此跨越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发展陷阱。

(四)高级经理人、经济循环与发展陷阱陷入

在经济系统中,并非所有企业主都是从事要素新组合或实施创新活动的企业家,还存在另一部分仅履行管理职能的高级经理人。高级经理人是指那些依赖过往经验和按照惯例对企业生产经营进行决策的企业主,其行为受规则与习惯所约束,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自动性、规律性、复发性、固定化特征(杨虎涛,2011;丁绒、饶品贵,2023)。知识一旦形成惯例,就会根植于个体心智和潜意识之中,不需频繁有意识地重新建构,以致在做任何一件事情时,行为均是自动产生的。作为一种节俭的组织记忆,惯例行事使高级经理人极大降低行动的不确定性和成本(Vromen,2006)。按照惯例决策的高级经理人,当期面对的情况与前期遇到的状况相同,在这种情形下并无新奇,所涉及的新知识极为有限,只需按照标准程序操作:在给定已知的约束条件下,决定企业怎么生产和生产多少(纳尔逊、温特,1997)。

高级经理人按照惯例行事在节约成本的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负面效应。一是造成企业自身步入能力陷阱。按照惯例行事将会使高级经理人决策产生严重路径依赖,依习惯和经验行事已成为自动行为的一部分;在这些习惯范围内的途径是高级经理人所熟悉的,范围之外进行决策的资料和规则是高级经理人的认知盲区,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因此例行事务边界以外的每一步都是有困难的,使其不再去思考改变和创新(谢康等,2016)。因此高级经理人往往在自身所熟悉的范围内行事,其职责只是纠正那些偏离轨道的行为,这将致使企业陷入能力陷阱(March,1991),导致新事物难以在旧有企业中诞生(Feldman and Pentland,2003)。二是拒绝和抵制竞争对手的创新活动。高级经理人不仅在熟悉范围之外行事更为困难,而且也难以接受新事物,即使旧有轨道难以适应新发展趋势,新事物也不存在应用困难,但思维还是习惯性回到原有轨道上,反对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事物(熊彼特,2020)。与此同时,由于在位高级经理人往往是经济系统中既得利益者,新事物是对其地位与利益的替代和竞争,因此在面对实施要素新组合的企业家时,高级经理人担心企业家创新活动对其垄断地位产生冲击,而通过各种手段(如寻求政府赋予行业垄断特权)设置市场进入壁垒来阻碍企业家创造性破坏(裴小革,2016)。高级经理人的决策方式受过往经验与惯例影响,容易在经济系统中形成了一种稳态的路径依赖与技术-经济范式,催生了社会惰性,这种惰性是对静态的膜拜并奴役和束缚经济发展(佩蕾丝,2007)。

区别于企业家与高级经理人的首要特征是,在经济系统中是否主动实施要素新组合、打破旧经济循环并推动经济体进入更高级经济循环。当一个企业先前依靠引入新事物而获得市场垄断地位且此后不再实施要素新组合时,企业中所有生产要素即进入了一种按照既定明确轨道周而复始循环

流转状态,该企业主就由创新型企业主变为管理型高级经理人。处于均匀循环流转中的经济系统不存在不确定性,高级经理人所有决策是在完全信息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仅对现有要素组合进行运营管理,以履行管理职能索取管理工资和正常利润。高级经理人满足并维持现有经济系统运行现状,反对要素新组合,不欢迎对旧有经济循环造成破坏的创新活动,热衷于维持现有经济循环和保护其市场垄断地位,阻挡资源向创新领域转移。因此高级经理人趋向于保护原有低质量经济循环,使经济体难以摆脱旧有经济循环束缚而跨越到更高收入的经济循环中,最终导致经济体陷入发展陷阱风险提高。

综上所述,发展陷阱本质是经济体无法从低收入经济循环向高收入经济循环转换的一种发展状态,而企业家精神则是推动经济系统进行这一转换的“扳道工”;但是,经济体能否跨越发展陷阱与所拥有的企业主数量并无必然联系,而是与企业主群体内部结构有关。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创新型企业主占比越高,经济体越容易跨越发展陷阱。

假说2:管理型高级经理人占比越高,经济体越容易陷入发展陷阱。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数据来源于全球企业家精神观察数据库(GEM)、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GEM数据库是由国际顶级学术机构美国巴布森学院和英国伦敦商学院1999年发起的一项旨在挖掘全球企业家精神的研究项目,是全球为数不多的直接从个体企业家收集各国企业家精神水平的数据来源之一,观测样本范围由最初的10个经济体扩大到目前115个经济体,为学界研究国家层面的企业家精神提供了数据支撑。本文整理得到时间跨度为2002—2017年、覆盖78个经济体的669个样本数据。

(二)模型设定

为实证检验企业家精神对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影响,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Trap_{it} = C_0 + \beta Entrepreneurship_{it} + \gamma X' + \varepsilon_{it}$$

其中, $Trap_{it}$ 为国家*i*在*t*期落入发展陷阱的风险; $Entrepreneurship_{it}$ 为国家*i*在*t*期所拥有的企业家精神程度; X' 为国家个体特征控制变量; ε_{it} 为随机干扰项; β 、 γ 为估计系数; C_0 为截距。

(三)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发展陷阱风险($Trap_{it}$)。部分研究从绝对视角利用经济增长速度(Eichengreen et al., 2012)、落入陷阱国家外在特征(Glawe and Wagner, 2016)来测度经济体落入发展陷阱风险。另有研究从相对视角以经济趋同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经济收敛与否的测量方法,将一个经济体的人均产出与另一个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发达经济体的人均产出之比作为经济体落入发展陷阱风险的衡量指标(Woo, 2012)。由于发展陷阱跨越本质上是一个相对变化的概念,是从相对较低产出水平向相对较高产出水平转变的过程,因此本文借鉴经济收敛测量方法,并鉴于美国是当今世界被公认的发达国家中最具发展活力的国家之一,采用一个国家与美国人均GDP之比来衡量该国落入发展陷阱的风险。

解释变量:企业家精神程度($Entrepreneurship_{it}$)。根据熊彼特对企业家的定义,将实施创新活动的企业主称之为创新型企业主,而将不再实施要素新组合、仅按旧有模式经营企业活动的企业主称

之为管理型高级经理人。GEM 问卷中有两个问题:受访者是否为创业者(正在创业者、新生创业者和在位创业者);创业者是否进行了产品或技术创新。本文借鉴汪辉平、王增涛(2018)研究方法,采用一国受访者中创业者的比重衡量该国总创业活跃度(TES),采用实施产品或技术创新活动的企业者占比衡量该国创新型企业企业家禀赋度(IES),采用没有实施创新活动的企业者占比衡量该国管理型高级经理人禀赋度(MES)。

控制变量。结合研究需要,选取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政府支出、技术进步、对外开放、城市化等国家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劳动力采用劳动力总数对数来衡量,资本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的资本存量对数来衡量^①,人力资本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对数来衡量,政府支出采用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对数来衡量,技术进步采用研发支出对数来衡量,对外开放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量对数来衡量,城市化采用城镇人口对数来衡量。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解释	单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Trap	发展陷阱	/	669	0.56	0.42	0.01	2.16
解释变量	TES	创业活跃度	/	669	0.11	0.07	0.01	0.63
	IES	企业家	/	669	0.04	0.03	0.00	0.23
	MES	高级经理人	/	669	0.07	0.06	0.001	0.54
控制变量	lnlabor	劳动力	人	669	16.06	1.50	12.05	20.00
	lnk	资本存量	美元	669	27.62	1.67	23.85	31.52
	lnedu	人力资本	年	669	2.32	0.25	0.34	2.65
	lngov	政府支出	美元	669	24.75	1.62	20.76	28.64
	lnres	技术进步	美元	669	21.89	2.20	14.47	27.03
	lncity	城市化水平	人	669	16.47	1.51	12.49	19.92
	lntrade	对外开放	美元	669	26.22	1.40	21.61	29.30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2 为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基准回归结果。表 2 第(1)列检验了总创业活跃度对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影响^②,结果所示,总创业活跃度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第(2)、(3)列分别检验了企业家、高级经理人禀赋度对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影响:企业家禀赋度回归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高级经理人禀赋度回归系数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家占比提高能有效促进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假说 1),而高级经理人占比提高显著增加经济体落入发展陷阱的风险(假说 2)。第(1)―(3)列表明,企业主群体中的企业家占比越高越有利于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而高级经理人占比越高越不利于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表 2 第(4)列检验企业家和高级经理人禀赋度同时放入模型中对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影响效应,结论同样成立。

① 将折旧率设为 5%。
② 本文计量回归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方法。

表2 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TES	-0.0107 (0.035)			
IES		0.1523** (0.071)		0.1667** (0.072)
MES			-0.0711* (0.043)	-0.0818* (0.043)
lnlabor	0.0224 (0.038)	0.0240 (0.038)	0.0180 (0.038)	0.0181 (0.038)
lnk	0.0918*** (0.015)	0.0917*** (0.015)	0.0895*** (0.015)	0.0886*** (0.015)
lnedu	0.0180 (0.029)	0.0084 (0.029)	0.0188 (0.029)	0.0095 (0.029)
lngov	0.0098 (0.009)	0.0110 (0.009)	0.0098 (0.009)	0.0109 (0.009)
lnres	-0.0033 (0.005)	-0.0021 (0.005)	-0.0030 (0.005)	-0.0017 (0.005)
lntrade	0.1044*** (0.012)	0.1038*** (0.012)	0.1053*** (0.012)	0.1051*** (0.012)
lncity	-0.1198*** (0.039)	-0.1205*** (0.039)	-0.1102*** (0.039)	-0.1075*** (0.039)
C	-3.1872*** (0.514)	-3.2179*** (0.512)	-3.2369*** (0.514)	-3.2852*** (0.512)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669	669	669	669
R ²	0.396	0.400	0.398	0.404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下表同。

其他控制变量。劳动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政府支出以及对外开放估计系数为正,与理论预期相符,表明这些因素有利于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研发投入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遗漏了与研发投入相关的关键性变量,使得估计结果有偏;城镇人口显著为负,可能是因为过度城镇化将不利于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与张晓晶(2015)等研究结论相一致。

(二)内生性问题

由于互为因果和遗漏变量问题的存在,上述回归估计可能会出现内生性问题。

1. 互为因果问题

当一个国家落入发展陷阱风险降低时,该国经济增长相对越迅速,繁荣的经济形势和庞大的市场需求越有利于企业家创新预期收益的增大,进行产品或技术创新的动机越强,引致企业家占比越多;反之,该国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萎缩则降低了创新预期收益,导致企业主趋于保守经营,从事创新活动的动机越弱,引致高级经理人占比也越多。为解决发展陷阱风险反作用于企业家精神而导致的

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方法对模型进行再估计。敢于冒险是个体内在的、相对独立于外部环境的独特品质,这种品质能够激发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与企业家精神密切相关;但一个国家落入发展陷阱的风险又难以影响企业主内在的创业冒险精神品质形成。因此将“敢于商业冒险”这一变量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工具变量既满足相关性条件又满足于外生性条件。GEM问卷设计了“您是否有失败恐惧症”这一问题,将其滞后1期作为企业家商业冒险品质的衡量指标。本文将回答“否”的企业主占比作为企业家禀赋度的工具变量——创业品质变量(FL1),将回答“是”的企业主占比作为高级经理人禀赋度的工具变量——守业品质变量(FL2)。

表3报告了采用面板工具变量法(2SLS)检验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回归结果。表中第(1)、(2)列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由结果可知,创业品质与企业家精神高度相关,而守业品质与高级经理人密切相关。第(3)列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发现企业家禀赋度估计系数为正,高级经理人禀赋度估计系数为负,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这说明在控制了双向因果关系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后,仍检验了企业家占比提高有利于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假说1),高级经理人占比提高增加了经济体落入发展陷阱的风险(假说2)。此外,通过两种检验验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Anderson canon. LM检验说明了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是相关的,是可识别的;Cragg-Donald Wald F检验说明了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

表3 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	(2)	(3)
	IES	MES	Trap
FL1	0.9229*** (0.041)	0.1833** (0.076)	
FL2	0.3230*** (0.039)	1.4921*** (0.074)	
IES			2.3310*** (0.560)
MES			-1.2174*** (0.36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数	503	503	503
Anderson canon. LM	162.087***		
Cragg-Donald Wald F	113.395***		

2. 遗漏变量问题

当遗漏重要变量时,模型也会出现内生性问题。市场化程度与经济体中的企业家精神水平息息相关,企业家精神形成有赖于市场化程度,企业家精神并不取决于经济体所拥有的资源,而是取决于让资源与机会被企业家利用的市场化制度,包括产权、契约自由、市场自由进入(Sautet, 2020)。因此

市场化程度不仅影响经济增长,也会对企业精神产生影响。上述模型虽控制了一系列经济体主要特征变量,仍因遗漏市场化程度而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需要对此加以控制。自1995年以来,《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会公布全球100多个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该指数反映了经济体市场化程度、经济活动不受政府干预程度,分数越高,经济自由度越高。本文采用经济自由度指数作为市场化程度的代理变量加以控制。

表4为控制重要遗漏变量后的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回归结果。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表明在控制重要遗漏变量后,同样验证总创业活跃度提高对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影响不显著,企业家占比提高有助于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假说1),高级经理人占比提高增加了经济体落入发展陷阱的风险(假说2)。

表4 控制重要遗漏变量回归结果

	(1)	(2)	(3)	(4)
TES	-0.0125 (0.036)			
IES		0.1511** (0.072)		0.1643** (0.072)
MES			-0.0732* (0.043)	-0.0827* (0.04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667	667	667	667
R ²	0.396	0.400	0.399	0.404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回归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以及避免变量测度有误引起的估计有偏,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解释变量、异常值处理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借鉴现有研究方法,采用经济体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落入发展陷阱风险的替代变量,回归结果如表5第(1)、(2)列所示。替换被解释变量后回归结果同样支持基准回归估计结果,第(1)列中总创业活跃度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企业家禀赋度估计系数显著为正,高级经理人禀赋度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2. 替换解释变量

根据现有研究方法,采用“自雇率”作为总创业活跃度的替代变量;基于GEM问卷中“未来6个月内,您是否认为存在一些好的创业机会”问题,将回答“是”的被访问者占比作为企业家禀赋度替代变量,将回答“否”的被访问者占比作为高级经理人禀赋度的替代变量,回归结果如表5第(3)、(4)列所示。替换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显示,总创业活跃度、企业家和高级经理人禀赋度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符号一致。

3. 异常值处理

为了避免异常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采用缩尾方法对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作 1% 缩尾处理,回归结果如表 5 第(5)、(6)列所示。结果显示,异常值处理后的企业家精神对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影响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无论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解释变量还是消除异常值影响,回归结果依然验证了总创业活跃度提高对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影响不显著,企业家占比提高有助于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假说 1),高级经理人占比提高则会加大经济体落入发展陷阱的风险(假说 2)。

表 5 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稳健性检验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异常值处理	
	(1)	(2)	(3)	(4)	(5)	(6)
TES	-0.0336 (0.033)		-0.0007 (0.001)		-0.0075 (0.038)	
IES		0.1028* (0.062)		0.2749** (0.117)		0.1738** (0.077)
MES		-0.1026** (0.042)		-0.3140*** (0.082)		-0.0766* (0.04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493	493	667	667	667	667
R ²	0.704	0.709	0.396	0.418	0.397	0.405

(四)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上述研究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将样本国家分为高、低收入经济体两组,实证检验企业家精神对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影响是否在不同发展类型国家中表现出异质性特征。世界银行依据一定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标准,将各国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首先将观测样本中的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归为低收入经济体,将中等偏上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归为高收入经济体;然后,分组实证检验企业家精神对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影响,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第(1)、(2)列为高收入经济体组别的回归估计结果,第(3)、(4)列为低收入经济体组别的回归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两组中总创业活跃度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企业家禀赋度估计系数在高收入经济体组中显著为正,而在低收入经济体组中为负但不显著,高级经理人禀赋度估计系数在高收入经济体组中显著为负,而在低收入经济体组中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在高收入经济体中企业家占比提高有助于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高级经理人占比提高不利于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而在低收入经济体中企业家和高级经理人占比提高对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影响不明显。其背后原因可能是:一方面,低收入经济体居民收入低下无力购买企业家推出的新产品,加之资本积累率水平低不足以支撑企业家进行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资本,使企业家占比提升难以促进低收入

经济体跨越经济发展陷阱;另一方面,在低收入经济体中,创业者整体素质较低、政策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较大,高级经理人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有限,其占比提高也不足以增加经济体落入发展陷阱的风险。

表6 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异质性检验

	高收入经济体		低收入经济体	
	(1)	(2)	(3)	(4)
TES	-0.0421 (0.043)		-0.0134 (0.008)	
IES		0.1678** (0.083)		-0.0005 (0.019)
MES		-0.1316** (0.052)		-0.0187 (0.01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599	599	68	68
R ²	0.526	0.534	0.941	0.943

(五)机制检验分析

企业家通过创新活动提高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进而促进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而高级经理人因阻碍生产要素重新组合、抑制要素边际生产力提高,进而加大经济体陷入发展陷阱的风险。本文将进一步实证检验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内在机制。

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可分为劳动边际生产力和资本边际生产力。首先基于C—D生产函数,推导出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计算公式^①,然后利用各国历年劳动力总数及按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资本存量^②,测算得到各国每年劳动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最后分别以劳动和资本边际生产率增长速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对企业家和高级经理人作回归估计,结果如表7第(1)—(4)列所示。结果发现总的创业活跃度估计系数均为负但不显著,企业家禀赋度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高级经理人禀赋度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经济系统中总创业活跃度提升对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增长影响不显著,企业家占比提升有利于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提高,高级经理人占比增加不利于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提高。表7第(5)、(6)列分别为劳动和资本边际生产力增长对经济体发展陷阱影响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资本和劳动边际生产力增速提高有利于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这验证了企业家精神是通过影响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进而作用于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

① 由C—D生产函数: $Y = AL^\alpha K^\beta$ (其中,Y为产出,L为劳动力数量,K为资本存量,A为技术进步, α 、 β 分别为劳动和资本边际产出弹性系数),推导出劳动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表达式: $MPL = \frac{\partial Y}{\partial L} = \alpha AL^{\alpha-1} K^\beta = \alpha \frac{AL^\alpha K^\beta}{L} = \alpha \frac{Y}{L} = \alpha y$, $MPK = \frac{\partial Y}{\partial K} = \beta AL^\alpha K^{\beta-1} = \beta \frac{AL^\alpha K^\beta}{K} = \beta \frac{Y}{K} = \beta \frac{y}{k}$,其中y和k分别为劳均产出和劳均资本存量。

② 利用永续盘存方法计算,其中折旧率设为5%。

表 7 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机制检验

	Mpk		Mpl		Trap	
	(1)	(2)	(3)	(4)	(5)	(6)
TES	-0.0242 (0.039)		-0.0612 (0.038)			
IES		0.1215* (0.073)		0.1161* (0.069)		
MES		-0.0982** (0.050)		-0.1460*** (0.047)		
Mpk					0.0997* (0.057)	
Mpl						0.1937*** (0.04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442	442	596	596	528	528
R ²	0.576	0.582	0.362	0.373	0.488	0.502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一个经济体在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阶段中,都会面临发展陷阱问题,例如非洲地区的马尔萨斯式低收入陷阱、拉美地区的中等收入陷阱及日本的高收入陷阱。但从部分国家发展经验看,能够成功跨越各阶段发展陷阱的国家或地区均有一个共同特点:经济体中的企业家精神活跃,新品牌企业层出不穷。鉴于此,本文基于熊彼特动态经济发展理论,构建企业家精神、经济循环与发展陷阱跨越的理论框架,并利用2002—2017年GEM公布的各国企业家精神数据,探析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影响。研究发现:发展陷阱的本质是经济体无法从低收入水平的经济循环向更高收入水平的经济循环切换,而企业家精神则是推动经济系统这一转换的“扳道工”;经济体能否跨越发展陷阱与其所拥有的企业主密度关联性较弱,而与企业主群体内部结构密切相关;实施毁灭性创新活动的企业家占比提高有利于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固守于旧有经济循环的高级经理人占比提高加大了经济体落入发展陷阱的风险。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明确企业家精神在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中的角色,切实提高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企业家是推动经济体持续跨越发展陷阱的重要力量之一,社会各界应正确认识企业家的社会经济功能,减少对企业家的偏见,给予企业家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尊重,在全社会中形成尊企、敬企、重企、爱企的良好氛围。

第二,积极营造企业家精神培育的政策环境,充分发挥企业家推动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积极作用。企业家能否成功实施创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外在政策环境,政府应加大信贷资源向创新企业倾斜力度,优化支持企业创新活动的财税政策,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

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第三,坚持竞争中性原则,促进企业优胜劣汰,形成良好企业进出机制,减少经济体跨越发展陷阱的阻力。高级经理人占比增加会加大经济体落入发展陷阱的风险,阻碍经济增长。因此,需要从完善市场机制出发,推动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减少不必要行政干预,以竞争中性为原则,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让市场决定企业的去留。

参考文献

- 蔡昉,2011,“‘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第12期,第4-9页。
- 丁绒、饶品贵,2023,“在希望的田野上:企业家农村经历与创业行业选择”,《南方经济》,第1期,第99-118页。
- 高伟,2010,“中等收入陷阱假说”,《人民论坛》,第13期,第12-13页。
- 龚刚、魏熙晔、杨先明、赵亮亮,2017,“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第61-86页。
- 卡萝塔·佩蕾兹,2007,《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理查德·纳尔逊、悉尼·温特,1997,《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毛盛志、张一林,2020,“金融发展、产业升级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金融研究》,第12期,第1-19页。
- 裴小草,2016,“论创新驱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经济研究》,第6期,第17-29页。
- 汪辉平、王增涛,2018,“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更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吗?”,《南开经济研究》,第4期,第85-101页。
- 谢康、吴瑶、肖静华、廖雪华,2016,“组织变革中的战略风险控制”,《管理世界》,第2期,第133-148页。
- 杨虎涛,2011,《演化经济学讲义》,北京:科学出版社。
- 伊斯雷尔·柯兹纳,2013,《竞争与企业家精神》,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约瑟夫·熊彼特,2020,《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张军扩、罗雨泽、宋荟柯,2019,“突破‘制度高墙’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验分析与理论研究结合视角”,《管理世界》,第11期,第1-7页。
- 张来明,2021,“中等收入国家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基本做法与思考”,《管理世界》,第2期,第1-11页。
- 张维迎、盛斌,2014,《论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张晓晶,2015,“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出路”,《国际经济评论》,第6期,第27-32页。
- 郑秉文,2011,“‘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第2-15页。
- Ahmad, M. and Nayan, S., 2019, “Income Inequality and Middle-income Trap: A Panel Data Analysis on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ety*, 20(2): 563-584.
- Barro, R.J., 2016, “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 Applied to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4(5): 5-19.
- Eichengreen, B., Park, D. and Shin, K., 2012, “When Fast-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sian Economic Papers*, 11(1): 42-87.
- Gill, I.S., Kharas, H.J. and Bhattasali, D., 2007,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 Glawe, L. and Wagner, H., 2016, “The Middle-Income Trap: Definitions, Theories and Countries Concerned”,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58(4): 507-538.
- Han, X. and Wei, S.J., 2017, “Re-examin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Hypothesis (MITH): What to Reject and What to Rev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73: 41-61.
- Ito, T., 2016, “Japanization: Is It Endemic or Epidemic?”, NBER Working Paper, No.21954.
- Lin, J.Y. and Wang, Y., 2020, “Structural Chang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Middle-Income Trap”,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Trade*, 20(2): 359-394.
- March, J.G., 1991,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2(1): 71-87.
- Ohno, K., 2009,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Renovat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mulation in Vietnam”,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25-43.

Sautet, F., 2020,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Entrepreneurship: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Policy", *Busines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tudies*, 13(2):31-35.

Vromen, J. J., 2006, "Routines, Genes and Program-Based Behavior",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6(5): 543-560.

Woo, W.T., 2012, "China Meets the Middle-Income Trap: The Large Potholes in the Road to Catching-Up",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10(4):313-336.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on Economies Overcoming Development Traps

Chen Mingming Liu Xiyao Nie Qihui

Abstract: How to avoid falling into the development trap in different income stages is an important challenge for every economy. By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ntrepreneurship, economic cycle and development trap cross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influencing economies to cross the development trap is explored and empirically tested using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 data from 2002-2017.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trap is essentially a state of development in which an economy is unable to shift from a low-income to a high-income economic cycle, and that entrepreneurship is the "switchman" that drives this transition of the economic system. Howev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bility of an economy to overcome the development trap and its business owner density is weak, due to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siness owners group. Entrepreneurial business owners-entrepreneurs break the old low-income economic cycle and drive the economy into a new higher-income economic cycle by implementing innovative activities with new combinations of factors, thus an increase in the share of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 facilitates the economy to overcome the development trap. Business owners-senior managers, who perform managerial functions, refuse the economic disruption caused by destructive innovation and cling to the old economic cycle. Thus the increase in the share of managerial senior managers increases the risk of the economy falling into a development trap. By redefining development traps, the article brings the development traps of low-income, middle-income and high-income stages into a unified analytical framework, which is conducive to a general and universal explan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henomena such as the "Malthusian" dilemma, the "Kluderman-Young" curse and the "Japanese disease" stagnat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proposed: First,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crossing the development trap of an economy should be clarified and the social status of entrepreneurs should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Second, we should actively create a policy environmen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entrepreneurs in promoting the economy to overcome the development trap. Thir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competition neutrality, promote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form a good mechanism for the entry and exit of enterprises, and reduce the resistance of the economy to overcome the development trap.

Keywords: Entrepreneurship; Economic Cycle; Development Trap

(责任编辑:杨学儒)